

上饶集中营

22
3)

上饒集中營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赵宜生

上饶集中营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31,000

1949 年 11 月第 1 版 1981 年 4 月第 8 版

1981 年 4 月第 33 次印刷 印数 293,001—393,000

书号 10074·2 定价 (六) 0.80 元

重 版 说 明

本书曾在解放区出版过。全国解放后，由我社先后出过修订第一版和修订第二版，这次与读者见面的是第三版。

这次重版，除了一些文章作了必要的修改外，又增加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记叶挺军长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生活片断》、《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炼狱散记》、《浩气长存》、《特别班》、《重返党的怀抱》等六篇，删去了原书中《西北特种拘留所》等附录五篇。

本书这次重版，得到了一些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支持，谭震林同志和粟裕同志还为本书题了词。

在本书修订过程中，中共上饶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也作了部分工作。

向 上 饑 集 中 营 坚 贞 不 屈
的 战 友 们 烈 士 们 致 敬。

譚 震 林 題

第 一 頁

譚震林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为重版
《上饶集中营》一书的题词。

在皖南事变中
为国家为人民
而英勇献身的
新四年烈士们
万古常青永垂
不朽！

粟裕

一九七九年八月

粟裕同志一九七九年八月为重版《上饶集中营》一书的题词。

目 录

上饶的集中营	长 江(1)
炼狱杂忆	青(5)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记叶挺军长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生活片断	叶育青 王聿先(61)
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	林秋若(69)
上饶集中营罪行	陈念棣(82)
炼狱散记	陈安裕(89)
如此“三民主义”教育	黄迪菲(105)
集中营生活散记	陈念棣(112)
卑劣的统治群 ——上饶集中营群丑像	陈念棣 孙秉泰(123)
进“茅家岭大学”	季 音(132)
站铁笼	赖少其(139)
记茅家岭两个月的生活	庞斗华(145)
茅家岭暴动	李 胜(151)
逃出茅家岭	李 胜(158)
茅家岭地狱	宿士平(165)
赤石暴动	陈念棣(196)
赤石暴动以后	孙秉泰 黄迪菲(208)
浩气长存	秦 峰(212)

抗日囚徒的旅行

- 集中营第三队移闽途中 干 戈 季 音(220)
集中营在福建 孙秉泰(228)
特别班 吴可仁(233)
重返党的怀抱 陈 平(239)
流浪散记 叶钦和(252)
哀施奇同志 叶钦和(274)
怀念孙锡禄同志 陈念棣(279)

上饶的集中营 长江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东南各省的千万青年和革命民众最憎恶的地方是上饶。这里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方，同时也是万恶的东南各省特务大本营。指挥东南各省特务的最高反动机关是三战区的情报专员室，情报专员是戴笠的重要杀人凶手张超。

上饶集中营对外的名称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前，分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集训总队（内分军士大队——在铅山和军官大队——在周田，大队长张超）和特别训练班（主任张超）两个单位；四月以后，改编为“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和国民党在西安的另一集中营“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西北分团”遥遥相对。西北分团属于蒋介石最亲信的干部胡宗南管理。

上饶集中营主要的分为下列几个部分：第一是七峰岩，第二是周田村，第三是茅家岭，第四是李村。还有一部分在石塘，其性质与周田村大致相同。这些地方都在上饶城的附近。

七峰岩可以说是政治软化所，周田村是苦工营，茅家岭是活地狱，李村是高等软化所。被捕入集中营的大致先经过七峰岩，然后周田村，最后便是茅家岭；上了茅家岭，纵算不死也弄得你酷刑余生，奄奄一息了。

这个集中营，在一九四二年六至七月浙赣路战事以前，里面关着许多有名人物，除叶挺军长外，还有冯雪峰、林植夫、黄诚、李子芳等。新闻记者有四个：两个是国际新闻社的计惜英和谷斯钦，一个是创办豫东大众报的徐师梁，一个是浙江民族日报的编辑王闻识。华侨青年有暹罗的陈子谷、安南的黄迪菲。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有几百干部被囚禁在这里。还有一部分是浙赣路一带教育文化机

关中被国民党特务认为思想上有问题的人物，如玉山县城某中学教员，上饶民众教育馆的艺术主任等。还有不少是由国民党部队机关中捉来的思想犯，这其中有一些是国民党军队里服务团的团员，有一些是国民党的政工人员，这一点和四川綦江县的集中营不同，那里是专门囚禁重庆国民党高级党政军机关中被认为思想犯的。

上饶集中营的主要部分在周田村，其中分为“军官大队”与“特别训练班”。军官大队共分为五个中队，其中第五中队的一个队为女生区队。“特别训练班”为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分子，由张超的亲信干部王寿山负责，此人阴险狠毒，新四军在皖南时代，他就在新四军的周围，不断进行奸细破坏工作，他们想把特训班的人训练成为革命的叛徒，作为特工的后备军。

在七峰岩中，囚犯是一律带脚镣，不许互相谈话，不许看书报，他们经常以所谓“情报员”的特工干部来进行个别谈话，实行欺骗。德苏战争爆发后，他们就说莫斯科已失守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就说抗战胜利已没有问题了，他们可以全力对内，镇压他们所谓“反动势力”。

他们自己捏造的小册子，如《新四军江南战绩》及《延安印象》、《抗大归来》等，强迫每人都要看，而且强迫大家都要相信。有一个“情报员”为了夸耀他们“特工”的伟大，又把《延安印象》、《抗大归来》的来路说了出来，原来是宪兵第八团一个班长派到延安去作奸细，回重庆后写成的；《新四军江南战绩》，完全是张超这般家伙的伪造。

管理七峰岩的有三个系统：担任卫兵的是三战区特务团，监督“囚犯”行动的是宪兵，作思想欺骗的是特工——情报员。为了争统治权，三方面时常斗争，曾经为了想强奸女犯，特务团和宪兵团几乎打起来，而他们对于“特工”，一致骂他们是“吃冤枉”的东西。

经过七峰岩的软化阶段，如果还不能达到被囚人自首的目的，就转到周田村，进入苦役阶段。

到了周田村集中营，不管是“军官大队”，或者是“特别训练班”，脚镣一律不要了。这几百人都关在有铁丝网的大围墙中，每天都是繁重的苦工：抬木料、打土墙、修房子、开马路、平操场、挑水、煮饭，凡是能想得出的苦工，总让你一天到晚没有丝毫休息，饭也不让你吃饱，饭里苍蝇屎不知多少，弄得大家生病，又不给你医药，使你疲惫不堪，日渐病弱。冯雪峰肚子上生一个大疮，愈烂愈深，每日流脓不止，他们也不许他医治，一定要“自首”了才可以请医生，所以他的病闹得非常危险。

对于“军官大队”的统治办法，比较更横蛮些，经常实行毒打。而对特训班，则苦工之外，仍然继续政治软化，不断派些所谓“教官”——特工——分别进行谈话，同时暗中布置内线，侦察“囚犯”之思想行动，往往最后还由张超亲自谈话一次；仍不能达到自首之目的时，他们最后的手段是送上“活地狱”茅家岭。

被他们判定为“顽固不化”的分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残酷的杖刑，由几个彪形大汉将手无寸铁的青年疯狂的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后，然后用粪箕或者由几个人挟到茅家岭。

到了茅家岭，又上脚镣，二三十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完全成了待决之囚，再出去的希望就很少了。但是他们也不把这些人枪决，只让他们长期受罪。有些人被“站铁笼”，铁笼内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过毒打的人，站不了多少时间就不能支持了，好人也站不过一天的；有些人被“针刺肚皮”，弄得全身是孔，叫苦连天；有些人被坐“老虎凳”；有的在冬天剥光衣服去吹风，夏天跪在太阳里硬晒；有的经常拖出来毒打。至于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说了，有些特务团士兵也看不过，他们说：“你们如果有罪，就应该枪决，如果无罪，又何必弄得半死半活呢？”

李村是囚禁叶军长的地方，叶军长最初表面比较受优待些，没有上脚镣，顾祝同要他写一个文件，说明新四军行动完全由项英负责，他断然拒绝。他说：“新四军一切责任我完全负担，与他人无关，应将其他被捕人员释放。”他在墙上写了许多诗，都被特务涂去，

还看得出的两句有“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九四一年夏天写的，后来特务要把他迁到另外地方，他不肯去，双方争执，被宪兵缚起来送走了。

国民党特工所希望的“自首”，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而答复他们的，除了不得已的忍耐而外，就是逃跑与暴动。周田村集中营经常发生逃跑事件，而茅家岭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来了一次大暴动，全部“犯人”夺了守卫的武装，冲出了地狱。

为了防止逃跑与暴动，“三战区情报专员室”以上饶为中心，三十里以内划为内层警戒线，密布军警，并强迫保甲长一律负责捕拿逃犯；三十里以外之皖南岩寺、浙江金华、福建崇安则为外层警戒线，这里派人于要路口把守，因此有一部分逃出来的革命青年被他们捉回去打死了，也有不少跑脱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军攻占上饶，这个集中营曾搬至福建，在赤石有一个队暴动出来，其余则到徐市成立新集中营。但是全国这样的集中营还有十几个，成千成万的革命青年还在水深火热中期待着解放呢！

炼 狱 杂 忆 一 青^①

前 言

许多同志集体创作的《上饶集中营》已经出版。他们写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的故事比较多些，我少写了这一方面，多写了些可笑可叹可愤可憎的东西。如果海内作家用这两方面材料写一个长篇，倒可成为一部反法西斯文学的巨著。

集中营里可以写作的材料实在太多，我不会运用、组织，真有从何说起之感。而且事隔有年，一时也记不起许多，所以我只能把追忆得出的，零零碎碎凑起来，写成这篇“杂忆”。所写的都是我亲历亲见亲闻的实事，有许多难友同志可以按证。其中年月日、数目字、事件顺序，或有记错，但亦不过“或有”而已。

人物的名姓，有的我确实忘记了，大多数是有意不写出的。我的许多朋友，他们对我崇高热烈的友情，我是铭感终身的，他们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一样永不会忘的。只是他们现在都还在法西斯反动统治下生活着，未得他们的同意，写出名姓，他们或许会不高兴，而且于他们确有所不便之处。

1940年12月，我坐了五个多月的几处牢监之后，被解到江西上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西山牢监。一座庙里关着百多犯人，有

① 一青即郭静唐。他在被捕前，是浙江省参议会的议员，因所谓“思想左倾”而被国民党逮捕。全国解放后，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1953年逝世。他的这篇文章写于1946年4月。

汉奸，有强盗犯，有普通刑事犯，有政治犯，有带着姨太太服侍的高等犯人，有穿着破单衣裤整日蜷伏在禾草堆里的低等犯人，形形色色，洋洋大观。

其中有个和我同姓的难友，他本是少将军需处长，判了十四年徒刑，已坐了一年零。再过几个月就可用调服军役的名义出去，自由地依法去“戴罪图功”了。他很热情和我认了五百年前的本家，对我特别关心，一天早晨他急急跑来通知我：

“你就要解到别的监房去哩！赶快准备。”

我问：“解到哪里去？”

“这可不知道。这里有三四处官司机关，每处不止一个监房。最苦的是政治部茅家岭的监房，依你的案情，恐怕会到那边去。”

我说：“已经换过五个监房，苦也够了，再苦也不过如此吧！”

“那不同！那不同！那边真叫苦！”他郑重地说。

“怎样苦法呢？”

他想了一下说：“总之，别的监房还有监房中的自由，那边监房之中有监房。别处还是十八层以上的地狱，那边是十八层之下的。”

我问：“是不是特务机关？”

“正是！正是！是属于特务专员室的。你得赶快准备，东西不要多带去，尤其是笔墨书籍，全身要搜查过的。钱藏好，有钱总可以少吃苦，最要紧！最要紧！”

我感谢了他的指教。知道事情更不妙。把东西检点了一下，把几百块钱分散藏在六七个衣袋中。不久，有两个带枪的兵来押送我。那个本家难友为我雇了个挑夫来，挑着衣物走。大路小路，绕绕弯弯，走了十多里。太阳快下山了，我问还有几多路，是不是上茅家岭。一个兵点了点头。我的心沉下去，想此去即使侥幸不死，也从此堕入深渊，不知何年何月爬出来。翻过小岭，就见到山下一座孤庙，门口站着卫兵，我就被带到这里。

进门就有一个年轻的军官走来，把我的铺盖衣包随便掀捏了几把，指着凳子说：“好！你就在这里坐一坐，等一会。”我想那个本

家难友的话，有点言过其实，这个看守军官还不算凶狠。

我坐下来，看到左厢两间狭长的监房，五六尺高的石墙上，排着短木栅。许多苍白的脸孔，夹在短木栅之间望着我。右边也有厢房，门口有几个女的，探着头张着我。青年军官在厅上踱来踱去，想和我说话，又不说。

直等到上灯，卫兵才说：“管理员回来了。”门口跌冲进一个人。青年军官对那人说：“管理员，我给你收下一个犯人。”那管理员口中“好！”“好！”地应着，冲过来指着我说：“你把衣服解开来！”我一面解纽扣，看那管理员穿着一身新的草绿色的制服，军帽高挺在脑后，乱发下面一对三角醉眼，眼珠里满绷红筋，眼下一只鹰嘴鼻，鼻端歪在半边。他冲上一步，问我有没有钱。一股酒气夹大蒜气，直喷过来。我闭着气从罩衫袋里取出一叠钞票递过去。他问：“还有吗？”伸手捏我棉袍袋，又被取出几张钞票。“你这个人不老实，我不会要你的！”他说着又伸手摸我棉祆袋、衬衣袋。他把我周身捏了又捏，裤子袜筒都摸捏过。叫我脱下鞋子，他提着鞋子倒抖几下，反复验着。又叫我打开铺盖，他把被头抖了又抖，捏了又捏，然后丢在地上，再要我打开衣包。我捏住了藏着钱的衣袋，一件一件抖给他看。他哼了一声，叫我把衣服包好。他两眼盯住我看了一会，说：“钱、衣包都存在我这里，不会少你的。”回头对卫兵说：“×班长，开大笼子！”说罢拿起我的衣包跌冲进厅后面去了。

卫兵开了笼门，我挟着被头，低头侧身挨进笼门。在一条灯心的油灯光下，见到一间长不到两丈，阔约一丈两三尺的房间，左右两旁连高铺，睡满着人。两铺中间夹着一条空隙，是进出路，可是有不少蓬头发和双脚挂出在铺沿，排满那条进出路。我呆立了一会，看到里面墙角边，似乎有个空隙，想就在地上胡乱睡一晚再说。一阵骚动之后，好不容易挨到角上，原来是摆着一只溺桶。我正在进退不得，一个人在说：“睡是没处睡了，大家靠着坐一夜再说。”一个青年坐起来招呼我，“到这边来！”我挨过去就靠着那青年坐着。

好不容易过了一夜。天亮了，大家坐起来。我见同室难友三十多

个，有老的，有年青的，也有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有几个是文质彬彬的，有几个是粗汉，更有三个和尚。据说都是政治犯，异党罪。

我从难友这里探问了这监房的情形和规矩。知道那管理员绰号叫“狗头”，非常凶，犯人的生活都由他管理。那青年军官不是特工，是守卫排排长，专负责警戒之责，不管犯人的事，和狗头搞不好的。这监房有两个笼子，共有五十多个犯人。另有一个优待室，除了一两个政治犯之外，其余五六个是特工，或是犯了特工纪律、或是闯了祸，到这里来坐禁闭的。那门口的一间房子，关着四五个女犯。我们的笼子终日关着，除了大便，不准到笼外，不象别的监狱，每天有放笼的时间。不准高声谈话，不准看书报，不准通信和接见亲友，一不小心就要站木笼。那木笼就放在厅上，大小正够直立一个人身，木栅上缠着三角刺的铁丝，站的人如靠着木栅，便会刺得皮破血流。如果被罚站木笼，轻则三四小时，重则一日一夜，甚至两三日，曾经站死过人。

上午卫兵来叫我到管理员那里去。进了厅后，左边一间房子，管理员坐在桌边，他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提起笔写在簿上，我纠正他几次笔划，他写了多时，嫌我的名字不好，笔划太多。

“你是什么案子的？”他侧着三角眼问我。

“我不知道。”

“你这人真不老实！自己犯了罪，还说不知道！”

“我没有犯罪！”

“不犯罪！难道请你来做上客吗？哼！哼！”歪鼻子在哼笑。

我想告诉他被捕经过。他说：“我不来问你这些。你到这里要守这里规矩，不要看他们捣乱分子的样！”

我不响。

他看了看簿子又说：“你的钱存在我这里，要买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买来。你的钱是不是九十六元？数目要弄清楚。”

我计算至少该有一百五十元，但我说：“这没有关系，不过用完

了，可不可叫外面的朋友送来？”

“你有什么朋友在上饶？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他探我口供了。我说了两个朋友的名字，一个是三战区经济机关负责人，一个是长官部的秘书，是三战区有声望的。管理员听到这两个名字，脸色和缓下来，带着不信的口气反诘：“是你的朋友？”

我答：“是要好的朋友，要钱要什么，只要通知他们，就会送来的。”

“这两个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帮你的忙？”

我说：“他们还不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哩！我在上饶的朋友还有几个，他们大概都在找寻我吧。”

管理员又问我那朋友的名字，在他听到几个三战区军政要人的名字，并且听到我说出他们的职位、籍贯、面貌之后，那青皮脸上装出笑容，叫我坐下来，又问我究竟为了什么案子。我把被捕的经过约略说了说，他同情似地说：

“有许多事也难说，你且安心在此，终能水落石出的。”

我要求他送信给一个朋友，他说：“本来是不准许的，但看你这人还忠厚，可以私下帮忙带出去。”我写了两三句交给他，他收受了（后来我知道他并没有送去）。我退出来。

不久一个卫兵来叫我移到一个小笼子里，据说比大笼子好一些。那小笼子比大笼子小一半，住着十七个人，却看不出有什么好一点的地方。难友们给我安排了铺位。有个立在铺上往外望着的难友说：“报告好消息，饭来了。”卫兵来开笼门，大家准备好碗筷。先拿进三瓦钵的菜汤，分放在铺上。以后拿进一桶饭来，大家围拢上去，用碗到桶里铲饭，有的满碗，有的大半碗。一个难友放了自己的碗，给我盛了一碗。我的饭量虽不大，但这样的碗至少吃三碗才会饱。但每餐吃到两碗的没有几个人，一般的只能吃到一碗或一碗半。我呢，从来没有吃过两碗饭。所以每天挨饿，那是不消说的了。

有一个专员室的组长来视察，到笼门外看了一看，叫大家都安